

史学论稿

余明侠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前言

我在高校任教达40余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徐州师范大学（包括其前身）度过的。自己所担任的教学任务，主要是中国近代史。1960年前后，由于国家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央遂采取了“调整巩固”的方针，我校的历史、地理、生物、美术等专业乃于此时被撤消。我则被调往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以文学史为主）的教学工作。由于教学相长的关系，又使我对这一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后，历史系重新恢复，我仍被调回执教。1994年离休，岁月匆匆，迄今已十年矣。

在任教的漫长期间，我先后发表了大小不等的论文一百余篇，计百余万字。最近，在亲友的鼓励下，我决定从中挑选一小部分自认为较有价值、较有影响的篇章，裒为一册，作为告别讲坛十载的纪念。书名原拟称之为“史学论集”，嗣于整理、审阅旧文稿时，发现不少文章的思想观点或昨是而今非；或今虽是而明日可能将非；再加上作为史学研究而言，自己并未深入堂奥，亦仅是开始学步而已。故其文虽已正式发表，但其实则应以“文稿”视之，命名为“史学论稿”较为确切。当然，我这样考虑问题并非葑菲自弃，而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书的内容，分为史学、文学、其它三类，共收文字多寡不一的大小文章凡58篇。现简略介绍其情况于后：

第一、史学类，共33篇。内分：中国古代史部分7篇，多因参加某些学术会议时的需要所作，或系一时兴之所至而写，故难言体系。中国近代史部分26篇，涉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中心）以及地方经济史，基本上涵盖了近代史的主要方面，而以太平

天国与洋务运动为重点。

第二、文学类，凡10篇。本来我是不想另立这一子目的，但鉴于其中《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一事的辨析》和《洪仁玕的文学思想》两文皆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列入文学范畴之内，于是就将其他一些性质相近的篇章，以类相从合并为一。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而文史本即相通，况又置于《史学论稿》之内，故与章氏之言深相契合。

第三、其他类，凡15篇。内分书序、书评及杂文三个部分，其性质基本上均属史学领域。而“杂文”中的《史学论文写作的若干体会》一篇，纯系个人多年来从事史学研究的点滴经验之积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许可为青年史学工作者创作论文时，提供一些借鉴。而关于“龙年”的考证一文于国外发表后，在美、加等国的华人社区中颇受重视，因其亦与史学有关，故予收入，以资参稽。

以上是本书的大体情况。至于每篇论文原来发表于何时、何地、何种报刊等情况，一律在每篇文章之末，以“按语”形式加以说明。而有些文章发表后是有一定影响的，也就所知者予以注明。但因个人所能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很难一一了解清楚。所以，疏漏也是难免的。我衷心期望今后凡见过拙书的同志们能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有所进益为幸。最后，我谨向鼓励、支持和帮助我出版这本拙书的亲友们，表示最大的谢忱。

作者

2004年9月16日

目 录

前言

一、史学类

(一) 古代部分

- 略论徐州汉代的宗教 《江苏社会科学》(1)
- 诸葛亮外交思想探析 《江海学刊》(8)
- 诸葛亮的法制观及《蜀科》的制订 《淮海文汇》(20)
- 试论诸葛亮的忠君爱国思想 《江海学刊》(29)
- 试论封建时代的“仁政”和农民起义的关系
..... 《淮海论坛》(40)
- 略论中国古代关于煤炭的使用及其发展
..... 《中学历史》(54)
- 新修《清史》有关体例体裁等问题之管见
.....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61)

(二) 近代部分

- 《南京条约》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南京条约与香港百年》(71)
- 近代封建把头制度探析 《江海学刊》(84)
- 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看农民战争的变化 ...
.....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97)
- 关于李秀成的战绩及评价问题 《历史研究》(110)
- 李秀成奏请改革一事的辨析 《光明日报》(143)
- 李秀成奏请改革而被革职原因考析 《江海学刊》(148)

李秀成二攻上海是否“不知君命”及战略得失考析	
——从《赖文光自述》谈起	
.....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59)
洪仁玕法制观初探	《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74)
洪仁玕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初探	《江淮论坛》(191)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
徐州煤矿发展史初探	《中国地方史志论文集》(215)
胡恩燮与徐州近代化煤矿	《南京大学学报》(233)
近代徐州利国驿煤矿剖析	《历史研究》(255)
左宗棠晚年洋务思想的变化及其进步性	
——从徐州近代化煤矿的创办谈起	
.....	上海《学术月刊》(271)
评价洋务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江淮论坛》(284)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矿业史的地位	《社会科学战线》(292)
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	
——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后的新发展	
.....	《江苏社会科学》(310)
关于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的评价问题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27)
容闳在洋务运动期间的主要建树	
.....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342)
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江海学刊》(358)
甲午战争失败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辨析	
.....	上海《社会科学》(372)
戊戌变法运动性质辨析	长春《社会科学战线》(387)
试论孙中山早年的重农思想	《江海学刊》(406)

也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 《湘潭大学学报》(420)

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产生及其评价
.....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427)

袁世传和民国时期的徐州贾汪煤矿 《民国档案》(443)

二、文学类

略论徐州汉代的文学 《江苏社会科学》(455)

关于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一事的辨析.....
.....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463)

南北朝乐府民歌..... 《中国文学史》(江西出版)(479)

《三国演义》人物故事考析·前言..... 《淮海文汇》(494)

选人物故事二则:

(一)“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其事吗?.....
..... 《淮海文汇》(495)

(二)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探析
..... 《光明日报》(502)

洪仁玕文学思想探析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504)

洪仁玕的诗歌赏析 《历史教学》(516)

洪仁玕的诗歌改革主张 《淮海文汇》(529)

关于洪仁玕的绝命诗
..... 美国纽约《世界日报》(中文)(535)

读孙中山的七律《挽刘道一》 《历史教学问题》(541)

叶淮同志诗作《霞绯集》读后感 《淮海文汇》(551)

三、其他类

(一) 书序

《徐州明清教育》序 (557)

《许衡轶闻故事集》序 (560)

《苏北近代工业史》序 (566)

《上海辐射与苏南发展研究》序 (569)

(二) 书评

评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 《历史教学》(573)

评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 《史学月刊》(579)

评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 《东南文化》(585)

评徐彻《慈禧大传》 《清史研究》(590)

评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
.....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596)

评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 《东岳论丛》(601)

评邱远猷、张希坡合著《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
法律制度研究》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605)

当代第一部《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周棉主编)再评介.....
.....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610)

(三) 杂文

史学论文写作的若干体会

——从《洪仁玕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初探》一文谈起 ...
..... 《社科论文写作入门》(617)

龙年与农历以及关于龙的考证
..... 加拿大《百合花》(华文杂志)(629)

“中学西渐”

——加拿大著名的中国文字学家李秋云女士访问记 ...
..... 《人民日报·海外版》(639)

后记..... (643)

略论徐州汉代的宗教

徐州是迄今已逾 2500 年以上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夏商周三代时的徐州属于全国九州之一，其幅员相当广阔。汉代将全国分为十三州，其中徐州下辖东海、琅邪、彭城、广陵、下邳等五郡（国），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省长江以北及山东省东南地区。今天的徐州市，则辖有铜山、邳县、新沂、睢宁、丰县、沛县等六县。因而本文对徐州两汉文化的探讨，乃是以汉代徐州的辖境和今天徐州的辖境相结合为标准，笔者认为这样比较客观而且符合历史实际。汉代徐州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彩，已有不少有水平有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故本文只能就论述较少的宗教方面的情况略抒己见，并对如何进一步开展这一研究工作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道教产生

1. 张道陵创立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源自古代以画符念咒为人祈福禳灾的巫术。道教正式诞生于东汉，尊奉老子为始祖，称为太上老君，这显然与汉代统治者信奉“黄老之术”有一定关系。道教徒为了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提高自己的地位，遂想方设法加以攀附。当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与崇信鬼神的道教完全是两回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西汉时，道教尚未产生，只有好谈“鬼神”的方士（道士的前身）在各地活动。降及东汉，道教正式出现。其创始人张道陵（原名张陵）为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在东汉顺帝（公元 126—144 年）时，

他作道书 24 篇，并用符水为人治病。因信奉者日众，遂创立道教。其主要经典为《老子五千文》（当时对《道德经》之通称）及《太平洞极经》等。凡入道者，须交五斗米，故又称五斗米道，这是道教定型化之始。由于道教信徒尊称张道陵为“天师”，遂亦名“天师道”。后来，张道陵死，子张衡继之；衡死，子鲁继立。从此，张氏子孙世为天师道教主。西晋时，张道陵的四世孙张盛移居龙虎山（在今江西贵溪境内），尊张道陵为“正一天师”，因而后世对其嗣立的子孙均称“张天师”。

道教虽然由张道陵创立，但盛行于世则在其张孙张鲁时期。“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1]。他继承祖业，积极弘扬道法。据传“张道陵病疟，于丘社中，得咒鬼术书，遂解使鬼法”^[2]。张鲁用这套法术来为人卜休咎、治疾病，深为贫苦无告、无钱治病的群众所信奉，因而道教的影响扩大了。公元 199 年（汉献帝初平二年），益州牧刘焉任张鲁为督义司马，率徒众攻取汉中，自称“师君”。张鲁以教中“祭酒”（祭神的长者）管理地方政治，政简刑轻；并在各地设立“义仓”，置“义米”，过路人可酌量取食；在春夏禁杀牲，以利牲畜生长。犯法之人，可原宥三次，然后用刑。有小过者，则罚令治道路百步，不改正才处刑。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干戈扰攘的岁月里，富庶安定的汉中可以算是一块乐土了。因此，关西人民陆续迁往者有数万家。公元 215 年（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曹操进攻汉中，张鲁败降。这一以农民为主体的道教徒所建立的政权虽然覆灭了，然而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却是应该肯定的。关于张鲁在汉中的治绩因为史书上不乏记载，这里不赘。但必须指出的是：创立中国道教的第一位教主张道陵是江苏丰县人，这是纯粹中国式的宗教，与佛教及基督教之来自外国者不同，此其一。其次，张道陵之孙张鲁所建立的汉中政权，其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教经典中所寄托的某些理想，这是我们研究道教文化时所必需探讨的，此其二。同时，张道陵所创立的道教，后

来被称为天师道，在历史不断前进的长河里，经过多次分合变革，道教一直延续下来，其影响不仅在国内，而且传播到朝鲜、越南等国家，此其三。抑有进者，道教的历史迄今已有 1800 多年，“张天师”之名早已家喻户晓，可是追本溯源、寻根访祖的话，徐州丰县乃是其祖师发祥之地，此其四。

2. 张角创立太平道

公元 184 年（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大起义轰轰烈烈地爆发了。张角是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他为了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就创立了太平道。它与张道陵的天师道是道教的不同教派。张道陵能通“鬼道”，为人治病；张角则手持九节鞭，画符诵咒，为人治病。两者均以治病为人世之媒，是其共同点。可是，在创教的目的性方面，两者则迥然相异。换言之，天师道不仅在民间流传，也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传播，因而能够公开地合法地长期存在。而太平道的创建则是为了推翻汉王朝的统治，以致后来遭到残酷地镇压而消亡。

太平道信奉的经典是《太平青领书》。这部书至迟在东汉顺帝时即已流传于世，其作者是谁？史籍无载。据《后汉书·襄楷传》云：“顺帝时，琅邪人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3]。由此可知：《太平青领书》在当时被称为“神书”，说明其珍贵性，而卷帙浩繁达 170 卷，其内容之丰富可以想见。

这部书得之于曲阳泉上，曲阳泉的地址在今天何处？历来说法不一。据后世考证，宫崇与其师干吉俱为琅邪郡人，喜在临郡东海活动。因而这个曲阳，“盖东海曲阳也”^[4]，其位置约在今天的徐州市新沂、邳县一带。泉水又在何处？已很难确考。

综上分析可知，《太平青领书》虽然很神秘，但在东汉末年已流传于民间，所以张角能够得到它。《三国演义》第一回中说是有一位神仙传授给他的，乃是小说家言，不足深论。然而这部“神

书”却出自当时的东海郡曲阳，则与今天的徐州有着密切的地缘联系。官崇说《太平青领书》是其师干吉于曲阳泉上得到的，因而此书的作者很可能就是干吉，曲阳则是其写作的地点。正是有了这部书，张角才创立了太平道，从而发动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故从这一角度看，徐州也是太平道的思想发源地。《太平青领书》与张陵所信奉的《太平洞极经》（144卷）之间的关系如何？因为两书俱佚，已很难查考。可是由于两者均属于道教的早期经籍^[5]，史籍上有《太平青领书》“其言以阴理五行为宗，而多巫覡杂语”^[6]的片断记载，故在内容上可能有其相通或相似之处。现存的《太平经》残本57卷，即产生于东汉。其书内容相当复杂，涉及天地、阴阳、五行、干支、灾异、鬼神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等，而其主旨则在宣传道教及封建伦理观念。但也有一些篇章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反对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主张自食其力和平均财富、救济贫苦的思想。由此看来，《太平经》的原本殆系由《太平洞极经》、《太平青领书》之类的道教典籍演变而来，自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但从中我们不难窥知它对东汉末年的道教活动，尤其是对张陵、张鲁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的深刻影响。需要指出，《太平经》是我们研究东汉后期社会状况和道教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由于此书的纂述，与徐州有一定的地缘的、人事上的渊源，所以，也是我们研究东汉时期徐州道教文化的重要资料。

（二）佛教的流传

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印度（古称天竺），东汉明帝（刘庄）时传入中国。佛教思想不仅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及民间风俗习惯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佛教在东汉兴起之后，徐州曾经为它的传播、发展起到了中转站和推广站的作用，彭

城则为弘扬佛法的中心地。汉光武帝于建武十七年（公元 41 年）封其子刘英为楚王，都彭城。明帝与刘英皆笃信佛教，他们两人乃是中国历史上大力提倡佛教的最早帝王。核诸史籍，汉明帝“遣使天竺问道佛法，遂于中国图其形象”。“楚王英最先好之”，“于是中国始传其术”^[7]。据此，刘英乃是佛教的最早信徒，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使佛教从京城洛阳向东传到彭城是有作用的。刘英曾为“佛屠”（佛）斋戒祭祀，供养“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门”（一译“沙门”，即和尚），明帝下诏褒奖他说：“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其斋戒仪式的推广，刘英也作了积极努力。故史称“汉自英（王）始盛斋戒祭祀之礼”^[8]。当时的洛阳和彭城，乃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两大据点。

自楚王刘英之后，佛教从彭城不断向东（东海郡）向南（广陵郡）推广。汉桓帝（刘志）时，彭城、下邳、广陵等地佛寺日增，信徒日众。汉灵帝（刘宏）末年任陶谦为徐州牧，谦信用佛教徒笮融，“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粮”^[9]，融遂于彭城等地“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10]。所费金钱，难以计算。不仅如此，他还以铜铸佛像，上涂黄金。佛寺周围可容三千多信徒，同时诵经礼佛。笮融还用免除各种徭役的办法，招致三郡之内及邻郡信佛的善男信女前来听讲，一时闻讯而来者达五千余户，佛教遂由徐州诸郡传播到相邻的江南州郡。后来笮融又到秣陵（今南京市）、豫章（今江西南昌境）等地从事活动，继续提倡佛教，大兴佛寺。总之，从楚王刘英到狂热的佛教信徒笮融，佛教遂以彭城为中心向附近各地发展，尤以南方的速度最快。在笮融的倡导下，佛教的重大节日“浴佛会”亦于每年农历四月八日（即佛祖释迦牟尼生日）举行，届期参加者及围观者竟达万人；笮融还多设酒饭，大行“布施”，这就开启了后世的布施僧道之风^[11]。当然，这样大规模的挥霍无度的宗教活动，又必然会给劳动人民

带来沉重的负担。

据上，可以明确以下三点：其一、汉代的徐州是交通便利、禾黍盈畴的富庶之区，汉代皇帝分封子弟于彭城，一是考虑其民殷物阜，二是考虑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一情况，佛教才得以在徐州地区流传、发展。其二、佛教自楚王刘英时在彭城开始传播后，经过了一百多年终于大行于世，反映了在外戚宦官黑暗统治下的人民大众在精神上的苦闷，因而寄情宗教以求解脱。其三、佛教的斋戒仪式、浴佛节及布施等习俗，均源自东汉时期的徐州彭城。因此，我们应当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碑画文物进行综合考察，以便深入地了解佛教文化在当时的传播情况，为佛教传播史增加新的内容。

（三）结束语

徐州是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中两汉时期约有 400 年，占全部时间 2500 年的六分之一。而汉朝又是中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时代之一，徐州则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两汉帝王祖籍之地。因此，我们开展徐州汉文化的研究，对于弘扬整个中华文明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上面，本文对于道教之产生与徐州的关系以及佛教在徐州流传、发展的情况均作了初步探讨，由此可知汉代的徐州在宗教方面所居的重要地位。鉴于对宗教文化的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重视的焦点之一，故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并进行一些交流活动，以扩大徐州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知名度。

由于徐州为汉文化的发源地，文化资源相当丰富。现有的汉画像石以及各种地下文物在国内均名列前茅。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深入地整理、研究这些已经发现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且将之分门别类汇编成集，以供查阅。如果我们能将文献史籍与文物资料密切结合起来，开展综合性的研究，以各种文物来补文献记载

之不足，或纠正其谬误；同时，又以文献史籍来考订各种文物的时间、内容及其价值，当会收到相得益彰的积极效果。特别是对汉代徐州地区宗教流传情况的研究，将会作出积极的贡献，而这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2] 李膺《蜀记》。

[3] 按：干吉或作于吉。他与《三国志·孙策传》中所说的于吉是否为一人？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待考。

[4] 见《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引。

[5] 道教的最早经籍为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的《天历包元太平经》12卷，已佚。

[6] 见《后汉书·襄楷传》。

[7] 《资治通鉴·汉纪》明帝永平八年。

[8] 《后汉书·楚英王传》。

[9] 《后汉书·陶谦传》。

[10] 同上。

[11] 以上参见《资治通鉴·汉纪》。

按：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997年第4期；又见《两汉文化研究》一书（徐州地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诸葛亮外交思想探析

东和孙权的外交思想

1. 东和孙权的基本出发点

两国交兵，争取与国，以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夺取胜利是十分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孙子兵法·谋攻篇》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把运用外交手段以获胜，置于杀敌致果、攻城夺地之上，对外交策略的重视，可以想见。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制订了“外结好孙权”的外交策略，其思想出发点主要是：

第一，“兴复汉室”是最终要实现的政治理想，但是要消灭已拥有百万之众的曹操，刘备是力不从心的，只能一面蓄积力量，等待时机；一面争取友邦，共同对敌。

第二，孙权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应当与它联合共抗曹操。

第三，刘备须先取荆州为根据地，然后再取益州为基业。修明政治，“南抚夷越”。一俟“天下有变”，分兵两路进行北伐，与曹操逐鹿中原。孙权作为同盟国家，亦可偏师牵制曹军，共收分军合击之效。

诸葛亮东和孙权的外交思想是为“兴复汉室”的最高战略目标服务的。他出山之后，一直在为实行这一外交方针而积极努力。

2. 孙刘联盟的建立与变化

吴蜀两国缔盟及其变化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孙刘联盟的建立（公元 208 年）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荆州，想一举消灭刘备、孙权，荡平江南。刘备率残部仓惶南逃至樊口，诸葛亮见形势危迫，乃向刘备建议亲自求救于孙权。而孙权此时鉴于曹操势大，心怀疑惧。其部下又分成和战两派，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经过了孔明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终于消除了孙权的顾虑，建立了联盟。孙刘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之后，曹操退回北方，孙权保有江东，并取得荆州部分土地；刘备则乘胜占领长江以南的荆州四郡。三国鼎立的雏型自此形成。

赤壁战后的翌年，孙权见刘备势力浸盛，又“进妹固好”^[1]，双方成为亲戚之邦。这一婚姻自然是政治性质，孙权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抗曹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也有通过妹妹监视、了解刘备动向的意图在内。不久，在刘备的请求下，孙权又将荆州要地江陵借给刘备，实际上则是将这一地区抵御曹操的防务移交给刘备，而孙权得以专力在东线抗衡曹军。这一时期的孙刘关系虽有矛盾，但不占主要地位。

第二时期：联盟的动摇

孙刘联盟的缔结，刘备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则为孙权，曹操乃是一个输家。赤壁战后，诸葛亮的联吴外交思想继续发挥作用，使得刘备得以向益州发展。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刘备进入成都，终于实现了“跨有荆益”的第一步战略目标。然而他这时却踌躇满志，骄矜之态日益显露，在思想上对“结好孙权”的重要性则日益淡漠。在刘备平定益州的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损失，即杰出谋士庞统在雒城战役中阵亡（214 年）。诸葛亮奉刘备之命率领张飞、赵云西援，荆州防务遂移交给关羽。这样做的不利后果有二：一是削弱了荆州的防御力量；二是关羽虽有“万人敌”之勇，却非一位谋略深远胸怀全局的帅才。所以，在人事安

排上是不恰当的。

关羽傲慢自大，对联吴的外交策略性毫无认识。陵轹侮慢，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他与吴国多次发生疆界纠纷，只是由于具有政治远见的鲁肃能够顾全大局，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事端。然而吴蜀联盟的裂痕却日益扩大。

在孙权方面，因曹操对南方采取守势而连年用兵关中，思想上对吴蜀联盟的重要性也发生变化，亟于想夺取荆州领土的意图却日益强烈，于是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了。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派吕蒙督兵2万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也从成都率兵5万支援关羽。正当双方剑拔弩张将以兵戎相见之际，忽传曹操攻入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权”^[1]。孙权考虑曹操对自己的威胁依然存在，不愿把路走得太绝，“复派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2]。双方乃议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湘水以东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吴，以西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属蜀。彼此之间的矛盾虽然暂时趋于缓和，但联盟的基础却动摇了。

在这次平分荆州的谈判中，诸葛亮的言行史籍无载。可是诸葛瑾奉命使蜀时，与孔明“公会相见”，自然会涉及这一问题。诸葛亮的“东连孙权”共抗曹操的思想自然起了一定作用，为刘备计，必须作出一定让步，以维护同盟关系，才能集中力量与曹操争夺汉中；为孙权计，也必须考虑唇亡齿寒的严重后果，如果曹操由汉中再据有益州，则吴国势孤力危亦难自全，因而决定适可而止，不为已甚。

第三时期：联盟的破裂（219年）

在这之后的三四年内，刘备集中力量进取汉中，击走曹操，巩固了益州的防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死后，吕蒙代理其任，积极为孙权画策，要消灭关羽，“全据长江形势”^[3]。而关羽刚愎自用，对吴国君臣的军事密谋掉以轻心，对脆弱的吴蜀联盟全然不知维护。孙权“尝遣使为其子求婚羽女，羽骂其使，不许